

沉浮二十年

“顽强”的电视问政

“这位胡专员究竟是什么级别呀？是多大的官啊？”2024年9月初，因为在一档电视问政节目中的“犀利发问”，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鹤走红网络。

在一段暗访短片中，有居民表示家门口的路长期有渣土车、大货车通行，导致门口晴天灰尘大、雨天有泥浆。面对群众诉求，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镇人民政府12345专员胡某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

作为一名参与了十多年电视问政节目的学者，陈鹤惊诧于舆论的热议。事实上，电视问政类节目存在的时间长于陈鹤参与的时间：2005年，兰州电视台创办的《一把手上电视》被视为此类节目的开端。而过去的20年间，全国至少拥有过243档电视问政节目。

对大部分普通网友而言，他们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官员们在节目中被问住时的窘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教授赵振宇曾多次参与电视问政节目的录制，在他看来，“电视问政的重点在于通过双向沟通，促进解决问题，不是说领导干部出丑了，它就办好了。”

“没有事前彩排”

陈鹤走红的视频片段，来自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大冶电视问政》播出的第15期。录制节目时，在台上接受问政的是各单位“一把手”。陈鹤说，这是大冶市委书记点名要求的。而据大冶本地媒体报道，录制第15期节目时，大冶市委书记、市长均在现场观看。

按照节目流程，播放暗访短片后，相关负责人会当场就问题进行回应，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观众对回应进行满意度投票。

陈鹤的“出圈”点评发生在满意度投票之后。“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胡专员）多次提到，群众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好像群众不该考虑自己的利益一样……要求群众大公无私，其实反过来，恰恰就是为了便于自己偷懒自私嘛！怎么现在反而要群众大公无私，而你可以无所作为呢？”

“节目是没有事先彩排

的。”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鹤表示，“接受问政的单位压根不知道暗访短片曝光的是哪方面的问题，更不知道主持人会问些什么。”陈鹤解释，“同样，在节目中，接受问政的单位会如何回应，我也是无法提前知晓的，所以我的点评只能是现场发挥。”

近年主流在“县一级”

在《大冶电视问政》走红前，电视问政类节目已经拥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和始于2004年的“兰州治庸”有关。

据央视新闻报道，彼时，因为腐败案的牵扯，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被撤换。2004年12月10日，新任市委书记陈宝生上任10天后，他在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兰州搞一个“治庸计划”，“向官员的平庸行为开刀”。

2005年5月8日，兰州市委审议通过了《关于整治干部平庸行为的计划》。5天后，在兰州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陈宝生首次提出“一把

手上电视”的设想。

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时任兰州电视台副台长汪小平回忆，他去找陈宝生商量节目的细节。陈宝生提出，希望“一把手”在面对镜头时，能让老百姓更直观地感受到各部门都在做什么、怎么做。基于此，汪小平建议节目就叫《一把手上电视》，“直接、响亮，也能体现栏目的意图”。

此后，包括湖北省武汉市《电视问政》、北京市《向前一步》、广西南宁《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山东省《问政山东》等在内，一批电视问政节目开始涌现。

不过，在陈鹤的观察里，近年来，录制电视问政节目的主流“在县一级”。

“在县一级做电视问政很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县委书记或（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在推动工作时明显感到下面的干部不好带。”陈鹤解释，在县级行政区，大部分干部的“天花板”在副科级，“如果一个干部在45岁左右才当上副科级干部，他往上晋升的空间就不多，工作积极性也不大，所以一些人就在那个位置上‘半躺平’。”

倘若县委书记想要有所作为，电视问政就会成为有效的推动工作的手段，“用舆论压力，用老百姓和民间的压力来倒逼干部作为”。

“一把手意志”

“一把手意志”体现在电视问政节目的多个方面。比如，西安电视台早有的问政



节目《问政时刻》原本两个月更新一期，但时任西安市委书记的王永康到西安广播电视台调研时指出，要把《每日聚焦》与《问政时刻》一起做成电视问政品牌栏目。此后，《问政时刻》的更新频率变为每月一期。

《问政山东》第一期是录播的，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看了这期节目后提出，节目很好，但是第二期一定要直播，并且每期节目应有两名副省级领导到场旁听。据媒体报道，4天后，《问政山东》录制第二期，刘家义的前述意见被执行，并在此后成为节目“标配”。

“一把手意志”的体现还在于，因为在电视问政节目曝光的问题，会让一些官员被处理。比如，2017年2月，在西安电视台《问政时刻》披露西安户县系列污染问题两天后，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3人被集体免职；2019年6月，在湖北省仙桃市纪委监委主办整治营商环境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全媒体问政活动次日，被质询的5个部门10名公职人员均被停职。

而也有一些官员，因为电视问政节目，仕途更进一步。曾和市委书记一起登上首期《一把手上电视》的兰州市粮食局局长司德成在不久后被调到某大口单位任职。

“有人说我的调动和‘一把手上电视’密不可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书记通过这个节目对我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司德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

上下两层共同需要

电视问政节目发展至今，一个客观现实是，相较于解决的具体问题，普通网友

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官员们在节目中的表现。在诸多对电视问政类节目进行二次创作的短视频或自媒体文章中，官员们“汗流浹背”“尴尬”“红了脸”的场景或节目嘉宾的“咄咄逼人”，成了被反复提起的关键词。

叶青曾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并以嘉宾身份多次参与录制《电视问政》，他评价说，“老百姓就觉得特别痛快，平时都是官员在管我们，现在也可以让你们出点小洋相。”

相较于节目开播之初的“轰轰烈烈”，20年之后，一些还存在的栏目，已有不同程度的“转型”。

2008年，陈宝生调离兰州。汪小平记得，大概3年后，《一把手上电视》改版成《民生民情大家谈》。《电视问政》后来也逐渐从“问政”向“问策”转变：过去“节目曝光问题——负责人解答”的模式，变成了嘉宾共同探讨问题的解决之道。

不过，与之相对的是，虽然每档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周期长短不一，但这种节目类型却一直存在，不停有新栏目在不同的电视台推出。

“这类节目能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在于满足了上下两层的共同需要。”在陈鹤看来，电视问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上层，地方主官需要把它作为改进干部作风、优化当地政风的抓手；在底层，普通百姓需要更直接的、能反映自己诉求的渠道。他们都是欢迎电视问政的。“可能就是中层干部，夹在中间，感觉压力比较大，个别人对电视问政有抵触情绪。” 李桂

